主编/韩忠良　本卷主编/林建法

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2004年文学批评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

21SHIJI ZHONGGUO WENXUE DAXI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主编/韩忠良　本卷主编/林建法

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2004年文学批评

春风文艺出版社

© 韩忠良 20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4年文学批评/韩忠良主编.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1
（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ISBN 7-5313-2853-4

Ⅰ. 2… Ⅱ. 韩… Ⅲ. 文学评论—中国—当代—选集
Ⅳ.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23935号

责任编辑：王维良
封面设计：耿志远 冯少玲

1、春风文艺出版社享有对本书与著作权有关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2、非法盗版，销售盗版书的行为是违法侵权行为，春风文艺出版社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3、欢迎各界人士对复制、发行、销售盗版书的侵权行为进行举报，出版社将予以奖励。

举报电话 024-22593831 春风文艺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
024-23284391 辽宁昊星律师事务所
陈 光 律师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110003
联系电话：024—23284393
购书电话：024—23284402
网址：www chinachunfeng net
幅面尺寸：148mm×210mm
字数：359千字
2005年1月第1版
印张：14 125 插页：2
印数：1—6000册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北宁市印刷厂印刷
定价：2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建立文学批评的新秩序

——《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4年文学批评》序

林建法

在编选这本年度批评选时，我和王尧教授正在合作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选》（上、下）的编选工作也接近尾声。在讨论如何编选《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选》时，王尧提出应当通过一个文学批评的选本来呈现一段学术史；他认为现在的文学史写作忽视了对当代文学批评演进过程的清理，文学史所建立的观点其实有一个学术积累的过程。这个想法我是赞同的，我在去年的序中提出期盼选本能够呈现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走向成熟的气象，表达的是相同的意思。

但细想起来，期许自己每年编选的年度文学批评选，能够从一个侧面呈现新世纪当代文学批评的学术进程，实在是件艰苦的工作。在编辑和阅读大量的文学批评文本时，我的选择和判断也常常有些迟疑。当下的文学批评，不能说不活跃，在各式各样的刊物上活跃着一批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身影，关于当代文学的批评总是占刊物相当的篇幅。问题是，作为知识生产的一种方式，当代文学批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重新解释了过往的历史？又在多大

程度上激活了当下的创作？这两个老生常谈的基本问题在考验着当代文学批评的品格，也在推动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进程。以此观之，当代文学批评或许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成熟。我这样的说法有点婉转，直截了当地说，我对大量的文学批评文本是不甚满意的。

这里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当代文学批评的学术化问题。在一般意义上，我是赞成文学批评的“学院化”的，尽管我从来不认为“学术”只在“学院”之中。应当注意到，在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的辉煌之后，批评家的文化身份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批评家所在的体制与文化语境同样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80年代，作家协会的批评家和学院的批评家可以说是二分文学批评的天下，从学术的冲击力量来看，前者并不比后者逊色。在批评家与作家的互动方面，作家协会的批评家甚至更为出色。但是，随着整个文学制度和学术制度的变化，学院在知识生产方面拥有的特别优势逐渐显现出来，学位制度和职称制度开始改变批评家的身份。这个变化就是批评家的学者化。从现象来看，学院的青年学者已经成为批评家中的多数，而学院外的学者式的批评家有的改换门庭成为大学里的专职教授，有的在联合申报学位点的过程中成为大学里的兼职导师。这个现象的背后，并不完全排除经济的因素，众多大学的年薪制对身在大学之外的批评家多少有些诱惑；但重要的是，今天的文学批评比起80年代来更需要学术背景与学科群体的支撑，90年代以来，大学的批评家在文学界的影响逐渐加大，文学的影响又重新和学术制度联系在一起，现在的批评家差不多清一色是“学院”出身了，80年代初中期批评家身份的分野基本消除。不少朋友在这方面似乎还有困惑，比如说，为什么有些水平一般的文学史著作在学生中也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显然，这就是今天的知识生产方式决定的，当文学的读者和研究者也越来越职业化时，文学史著作以及大学教授的讲授已经成为知识生产的一个主要环节。与此相关的一个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象是，在一些高校，即使是充满真知灼见的当代作家作品论甚至不被看作学术论文。这个令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在与当代文学批评相关的新的学术制度形成过程中，我们并不能高枕无忧。

毫无疑问，这样的变化在整体上改变了当代文学批评的语境和关于当代文学批评的评价体系。我们可以看到，当代文学批评已经发生一些变化：跟踪式的、短平快式的作家作品论在减少，一向在这方面有突出表现的批评家也开始寻找自己的研究领域，开始重视“长线”课题的研究；即便是作品论，也不同以往的感悟式的批评，批评家在阐释作品时通常都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理论背景与立场。与此同时，试图对文学现象和文学史个案进行理论阐释的论文在增多。这一现象表明一些批评家对以往文学批评学术含量和当下文学创作水平有所质疑。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每年不断增加的博士、硕士论文也在推动当代文学批评的制度化。文学批评的文化研究化也成为这几年学术界的一大趋势，我在去年的序言中也谈到这个问题，原来的分歧还在延续，文学研究的不同路向越来越分明，这依然是今年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色。对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两者关系的不同理解，突出了文化研究如何中国化的问题。

也许从大的方面来说，批评家身份的变化以及研究对象的转换，意味着在新的学术制度中文学批评的秩序正在重新建立。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与契机，但我并不因此觉得解决文学批评中的问题可以一劳永逸。在重新建立文学批评秩序时，大而化之地说，文学批评仍然处于前景未明的时期。我比较担心的是批评家在新的学术制度（包括刊物的等级化）中是否会钝化自己的问题意识（不仅是关于现实的问题意识），现在有许多批评之所以无足轻重、不关痛痒，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批评缺少问题意识或者讨论的是伪问题。我觉得批评的能力就在于它能够提出问题、解释问题，如果避开对问题的研究，批评家的学术水平就无从说起。我以为，在新的制度中，知识背景已经发生转换的批评家在这方

面应当有长足的进步。

我所说的这些变化，在今年的文学批评中有充分的反映。由入选的论文看，南帆《符号的角逐》、蔡翔《专业主义和新意识形态》、王富仁《“西方话语”与中国当代文化》、罗岗《“主奴结构”与“底层”发声》显示文化研究方法的使用在批评家手中越来越娴熟，而且在突破传统研究的限制中有新的理论发现。在另外的学术路径中，温儒敏《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空洞化”现向》、陈思和《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所提出的问题和方法对纠正时弊、倡导良好的学风有针对性和积极意义。雷达《当今文学审美趋向辨析》、张光芒《论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三次转型”》或具体或宏观地分析把握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今年的批评界相对比较寂寞，鲁枢元《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增添了些许生气。王鸿生《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事》、姚晓雷《“绵羊地”里的冷峻剖析》、张学昕《“唯美”的叙述》、董之林《“身上的鬼”和“日常的梦”》、刘志荣《生命最后的智慧之歌：穆旦在一九七六》对阎连科、李佩甫、苏童、毕飞宇、穆旦作品的分析，知人论世，把握关键问题，见出文学批评的理论力量，反拨了印象式批评的浮泛。我一直看重作家的“夫子自道”，这次选了莫言《文学个性化刍议》和韩少功的《写作四题》，他们独到的见解往往一针见血，而且没有批评家的迂腐。关于诗歌的研究，这次入选的唐晓渡《一次不确定的语言历险》、林岗《海外经验与新诗的兴起》，是近几年来难得的诗论。贺桂梅《挪用与重构》对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的关系这一命题再解读，宏观而细致；陈晓明《整体性的破解》是研究当代长篇小说的新收获；王尧今年用口述史的理论和方法重新叙述新时期文学史颇受关注，入选的《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是创新文学史写作的成功尝试；这三篇论文从不同的方面拓展和深化了当代文学史研究。关于文学传媒的研究可视为文学制度研究的一部分，程光炜《文艺报“编者按”简论》、黄发有《文学期

刊与先锋文学》以期刊见证文学史，视角与方法都有独特之处。耿占春《文学阅读的兴衰》，对我们已经熟视无睹的现象作了有意义的解析。

入选的这些论文让我在平淡的阅读中有了点兴奋的感觉，而紧随其后的问题仍然是：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离当代文学学科化的目标还有多远？

目 录

001/建立文学批评的新秩序 ---------- 林建法

文学思潮与现象

001/符号的角逐 ---------- 南 帆
027/专业主义和新意识形态
——对当代文学史的另一种思考角度 ---------- 蔡 翔
057/当今文学审美趋向辨析 ---------- 雷 达
073/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
——“审美日常生活化”的价值取向析疑 ---------- 鲁枢元
091/论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三次转型” ---------- 张光芒

当代作家评论

120/写作四题 ---------- 韩少功
128/文学个性化刍议 ---------- 莫 言
137/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事
——读《受活》 ---------- 王鸿生
156/“绵羊地”里的冷峻剖析
——李佩甫小说的主题方面的解读 ---------- 姚晓雷
168/“唯美”的叙述
——苏童短篇小说论 ---------- 张学昕
187/“身上的鬼”和“日常的梦”
——关于毕飞宇的小说 ---------- 董之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02/生命最后的智慧之歌:穆旦在一九七六 ---------- 刘志荣

现代汉诗研究

219/海外经验与新诗的兴起 ---------- 林　岗
240/一次不确定的语言历险
——麦城的《形而上学的上游》 ---------- 唐晓渡

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

255/“西方话语”与中国现当代文化 ---------- 王富仁
274/“主奴结构”与“底层”发声
——从保罗·弗莱雷到鲁迅 ---------- 罗　岗

文学史写作与研究

308/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空洞化”现象 ---------- 温儒敏
317/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 ---------- 陈思和
337/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
——以“先锋”与“寻根”等文学话语的
缠绕为线索 ---------- 王　尧
357/挪用与重构
——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 ---------- 贺桂梅
379/整体性的破解
——长篇小说的历史变形记 ---------- 陈晓明

400/文学阅读的兴衰
——一个阅读的社会学话题 ---------- 耿占春

文学传媒研究

412/《文艺报》“编者按”简论 ----------程光炜
427/文学期刊与先锋文学 ----------黄发有　王云芳

符号的角逐

南　帆

一

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以及结构主义之后，文本分析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批评策略。大批理论家共同将语言形容为文学的主角，心理、哲学思想或者主题类型的意义退居次要。文本是语言编织物，因而文本隐藏了文学的首要秘密。肌理、张力、象征、叙事模式，还有无所不在的结构——一系列新型的理论概念进驻文本，条分缕析，剔精抉微。这些概念对于文本外部的历史语境置若罔闻；或者说，这些概念隐含的前提即是，文本的结构与外部的历史语境无关。对于文学说来，语言的秘密与社会历史的秘密不可通约。

然而，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这种狂热一时的理论倾向逐渐遭到遏制。文本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再度浮出水面。不考虑书面文字与口头传播的差异，单纯的文本分析怎么能说明古典诗词的精粹和话本的缓慢松弛？解释电视肥皂剧拖沓的修辞风格，人们

必须回到早期的历史——那时的观众定位为午后忙碌在厨房与客厅的家庭主妇，她们无法在操劳的间隙跟上一个紧张的故事；然而，赞助电视制作的广告商不得不竭力讨好她们，因为家庭主妇掌握了大部分的采购权。总之，文本生产不仅局限于语言作坊内部，社会历史可能对文本的每一个细部产生压力。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对于文本成规以及叙事、修辞的隐蔽控制引起了理论的持续关注。如何叙事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人们逐渐意识到，愈来愈多的文本占据了生活，并且主宰或者规约、支持种种生活的想象。很大一部分生活即是“叙事”的产物。换一句话说，文本既是社会历史的符号凝结；同时，文本又织入社会历史的一个个角落，形成种种压力，这些压力循着不同的方向扩散至现行的社会历史结构。这个意义上，文本生产不可避免地与各种权力体系产生互动。文本以及符号被动员起来，有效地维持或者破坏某种等级制度，并且由于特定集团、阶层、群体的要求和使用形成独特的风格。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以及结构主义曾经把文本供奉为一个孤立封闭的神秘王国，孤立、封闭、不可再分解即是文本拜物教的依据。这仿佛证明，是独一无二的文学性而不是别的什么决定了文本的结构。然而，现今的理论发现，文本并没有甩下社会历史；文本的结构隐藏了强大的历史根源，而且，文本可能产生的社会功效远远超出通常的想象。

晚近兴盛的“文化研究”有力地支持了这种观念。文化研究的分析范围早已突破了文本的藩篱，建筑、舞蹈、海报、经济学著作的修辞特征、博物馆陈设、电视肥皂剧、侦探小说、电子游戏以及体育赛事无一不能装入文化研究的百宝箱。有趣的是，文化研究时常对上述领域作出符号学的解读。许多时候，文化研究毋宁说将世界当成了一个大型的文本——人们时常遭遇“社会文本”这个象征性的概念。世界的大型文本内部包含了无数次级文本。电视、报纸、广告、杂志、广播、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密集地包围了人们，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即是将主体抛入形形色色的

文本之间。置身于这个世界，人们的身份、社会地位通常是被“叙事”出来的。种族、性别、阶层、尊严、荣誉，何谓成功、何谓时尚、何谓可耻、何谓无能——诸如此类的知识精密地构成了一个主体的定位。反之，如果一个主体拒绝认同社会定位，那么，他首先可能拒绝既定的叙事。这时，一种复杂的争夺、冲突、压迫、反抗、解放将在符号领域展开。显然，这里所谈论的符号不仅是能指与所指的单纯合作，它不仅显示出单纯的指示功能。符号愈来愈明显地成为一种可观的生活资源。符号可能是某种昂贵的商品，形成庞大的产业，也可能是极富杀伤力的政治工具。因此，如何制作符号、收集符号、占有符号，如何使用符号巧妙地叙事，这是事关重大的社会活动。许多时候，掌握符号也就是掌握权柄；深刻地解读符号可能揭破某种秘密的圈套，也可能掘出某种革命的资源。

沃卓斯基兄弟导演的《黑客帝国》肯定可以成为文化研究所钟爱的话题。这部科幻影片虚构了一个古怪的情节：未来的人们困在一个符号的世界而无法自知。这些人的日常见闻无非是一台巨大的计算机虚拟出来的世间万象。一切幻象都是程序的产物。影片之中，英雄主角的动机就是冲出符号的炫惑，逃离数字化的统治。这显然是一个不无哲学意味的时髦主题。沃卓斯基兄弟是鲍德里亚的忠实信徒。有消息说，他们甚至邀请鲍德里亚出任影片之中的一个角色。不难发现，《黑客帝国》是鲍德里亚某一方面思想的通俗版本。鲍德里亚激进地声称，后现代社会业已被技术和传媒严密控制，符号、影像和代码充斥整个社会，真实与非真实之间的明确界限消失了。人们习惯于透过种种特殊的传媒观察世界、熟悉世界、掌握世界，传媒所演示的符号结构理所当然地成了现实本身——甚至比真实还要真实。人们无限地依赖电视，依赖互联网或者报纸，挣脱或者抨击一种传媒之后无非是投入另一种传媒。只有借助传媒的拐杖，人们才可能想象社会，进而想象自己的位置，决定怎么说和怎么做。这些符号体系是否某

种真实的指代已经不太重要——它们有时甚至与真实失去了任何联系；重要的是，这些符号自身成了主体，互相勾结，并且作为一种商品拥有了经济交换价值。这是能指的自主化，能指成为自己的指涉物，同时倾入经济流通领域。很大程度上，符号形式开始覆盖了商品形式。商品的物质属性愈来愈少，符号形式已经足以挑起人们的购买欲望。扛一袋米或者提一条猪腿的景象正在减少，许多时候，人们消费的是符号形式。“虚拟经济”一跃成为现今锋头正健的概念。期货、股票、广告、转账、信用卡，诸多交易在符号领域出没——货币本身即是最为权威的符号作品。后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即是——无远弗届的符号覆盖。后现代转向可以视为符号运作的一个历史性后果。电子传媒正在制造“无地方特性”的图像地理和虚拟地理。传统的自然地理形成的种种坐标体系陆续失效，远和近、深和浅、旧和新等一系列空间感和时间感开始动摇——这种迷惘和恐慌即是后现代的典型经验。人们的周围莫非符号形式，真实与幻象、文化与自然的二元论终于瓦解。这个意义上，人们只能栖身于一个没有起源、没有指涉点的多维空间[①]。符号之外一无所有，这就是鲍德里亚提供的一个不无诡异的理论图像。

许多人觉得，鲍德里亚的理论图像多少有些危言耸听。相对地说，斯图尔特·霍尔对于构成主义的阐述似乎更为中肯。霍尔不再纠缠于真实与幻象的二元论，他的理论焦点转向了“意义”。意义使现实成为可解的形态。无论真实与否，形形色色的“意义”是支配生活的核心：“它们组织和规范社会实践，影响我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真实的、实际的后果。”[②] 索绪尔以来的一系

① 参见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主义转向》第三章《从景观社会到类象王国：德博尔、鲍德里亚与后现代性》，陈刚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② 斯图尔特·霍尔：《表征》，第3页，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列理论遗产证明，语言、符号的运作——霍尔的术语称之为“表征”（represent）——决定了意义的生产。这再度证明了符号在社会生活中心的决定性作用。霍尔总结了人们解释“表征”（represent）的不同理论：“反映论的或模仿论的途径提出词（符号）和事物之间的一种直接和透明的模仿或反映关系。意向性的理论把表征限制在其作者或主体的各种意向中。”① 霍尔主张的构成主义源于社会知识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转向——话语转向。构成主义看来，意义不是先验地存在于某种事物之中，等待一个外部的“发现”或者垂顾，意义是在人们认识某种事物的同时被生产、被建构出来的。语言符号支持了这种生产或者建构的实践。语言符号的成规惯例设定了事物如何呈现，同时设定了意义解读的基本框架。这时的符号与事物之间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指代关系，符号自身所构成的表征系统内在地控制了人们的认识程序，组织人们的认识视野——包括认识一些抽象的甚至纯粹虚构的概念，例如幸福、友谊或者天使、恶魔、地狱，如此等等。霍尔解释说，所谓的“表征系统”“并不是由单独的各个概念所组成，而是由对各个概念的组织、集束、安排和分级，以及在它们之间建立复杂联系的各种方法所组成。”② 换言之，事物的意义就是在这种“复杂联系”之中逐渐敞亮，并且成为一个严密的、相互呼应的系统。霍尔即是在这个意义上为福柯辩护。福柯并未否认，事物存在于话语之外，但福柯论证了“在话语以外，事物没有任何意义。”③

“意义有助于建立起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和得以控制的各种规

---

① 斯图尔特·霍尔：《表征》，第35页，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② 斯图尔特·霍尔：《表征》，第17页，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③ 斯图尔特·霍尔：《表征》，第45页，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则、标准和惯例”——所以，霍尔同时意识到：“意义也是那些想要控制和规范他人行为和观念的人试图建立和形成的东西。”[①] 这也是人们将语言符号的运作纳入权力运作的理由。从历史的叙事到民族的想象共同体，从简赅的标语口号到繁琐的仪式，对于权力运作说来，语言符号的能量始终不亚于暴力武器。当然，并不是所有擅长使用符号的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作家号称语言大师，但是，许多作家对于语言符号的历史使命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他们似乎更乐于接受这种浪漫主义式的形容：一个人的语言才赋是一种天生的感觉，这种天生的感觉驱动作家援笔疾书。语言无非是一种称手的工具，负责滔滔不绝地演示作家的奇妙灵感。如同穿上了红舞鞋的舞蹈家，作家不会也不可能停止写作。目前，只有韩少功的《暗示》对于自己手里的语言——更大范围内，包括各种符号体系——产生了深刻的怀疑。韩少功的《暗示》流露了一种恐惧：他担心陷入语言以及种种符号体系如同陷入某种迷魂阵，人们徘徊在一系列语词和虚拟的影像之间，再也回不到土地、阳光、潺潺流水和风花雪月的真实世界。令人忧虑的是，符号的世界时常被有意设计为一个不平等的世界。再现什么，遮蔽什么，夸张什么，涂抹什么，《暗示》犀利地察觉到一系列符号运作隐藏的政治企图。我曾经借助《暗示》来陈述这种观点：

现今，情况也许更为复杂：语言符号的占有可能形成特定的文化资本，这将生产出另一种话语权力。无论是支配、榨取、统治、弹压，文化资本的运作正在制造各种崭新的形式。大众传播媒介如此发达、语言符号如此丰富的时代，一批人运用语言符号压迫另一批人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种种语言符号体系之中，某

① 斯图尔特·霍尔：《表征》，第4页，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